



# 《山海经》里藏着海洋文化秘密

□ 马俊杰

有一个关于人和海的神话：一个小女孩在大海中溺亡，她的灵魂不灭，化作一只小鸟，不断从西山衔来石子，扔到东海之中，要把大海填平。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精卫填海”，出自古代典籍《山海经》。

虽然精卫填海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人们未必知道这个故事所隐含的所有深意。笔者试图从《山海经》与海洋的关系入手，去探寻《山海经》为后人构造的神秘世界，揭开精卫填海的秘密。

我们首先来看《山海经》的书名。“山”指的是山川，“海”指的是海洋，“经”并非现代人理解的经典，而有经界、经历之意。经界就是疆界、界限的意思，经历即“经久历远”。如此看来，“山海经”即“历经山海之疆界”。毫无疑问，《山海经》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山海经》的内容也大量涉及海洋，文字中“海内”“海外”“东海”“南海”“渤海”等关键概念的出现便是证明。虽然“山”也是它叙述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描述山的时候，都伴随着水的追根溯源，而大多数发源于山的江河，在作者的笔下也与大海相连。所以，从山海关系的角度讲，《山海经》是一部以叙述山和海洋界限为主线的综合性作品。

## 记载沿海地理：琅琊台就在那里

《山海经》共18卷，从《山海经》内容构成看，它涉及4个主要的地理概念，即“山”“海内”“海外”和“大荒”，其中“海内”“海外”和“大荒”都与海有着直接关系，“山”也间接与海洋有关。

古代人们以海岸线为界线，把眼前之世界划分为“海内”和“海外”，“海内”是指海岸线以内的陆地，“海外”是指海岸线以外的海洋和陆地。当然，这里的海岸线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华夏先民居住的岛屿当然属于海岸线以内。“大荒”是指人迹罕至，非常荒凉的地方，在大海方向上，就是指“海外”更遥远的地方。

在《山海经》的记述中，与沿海地理相吻合的例子比比皆是，琅琊台即是其中之一。《海内东经》：“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间。”这句话的含义很明确，琅琊台位于琅琊东部的渤海之中。

历史上的琅琊（也作“琅邪”）位于密州诸城县东南，即现在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的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如今琅琊台已与陆地相连。春秋时，琅琊是齐国的城邑，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将越国都城由会稽迁往琅琊。在琅琊东部的海中有一座山，越王在山上筑起观台，台周围7里，以望东海，故名“琅琊台”。《说文解字》：“琅琊台在渤海间，故称琅琊台”。秦始皇当年东巡时，有600次登上琅琊台，在台上留下“始皇碑”，碑上有“功不可识”。汉代在琅琊设琅琊县，汉武帝东巡时也多次登台。至于琅琊台以北的那座山，据清代郝懿行考证，即劳山（今作“崂山”），劳山在海间，又叫牟山，方位是准确的。

瓠、闽也可在现代地理中找到其位置。《海内南经》：“瓠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瓠是浙江省温州市的别称，汉代初期温州一带为东瓠，今浙江省东南境有瓠江，也称永宁江。闽是今福建省的简称。瓠、闽都是我国古代氏族，其聚居地为浙江、福建及沿海岛屿，是确凿无疑的。

即使今天我们对《山海经》记载的很多区域或方国难以判断其真实性，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距今数千年的上古时期地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窥视之，也实难洞穿其中的所有奥妙，也就不可能作出全面准确的诠释。



视觉中国供图

## 描述海外方国：黑齿国真的存在吗

所谓方国，是指上古时代以及夏商时期出现的部落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有所不同，方国的区域很小，一般拥有一块封地，或一个区域。《山海经》大量描述了方国的情况，据统计有40个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海外”和“大荒”之中。

这些位于“海外”和“大荒”中的方国是否真的存在呢？笔者认为，《山海经》所记载的海外方国，至少有一些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它们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之后，有些面目全非，但在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海外东经》提到的黑齿国就是如此：“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文中的“其”是指豎亥，即是说，在豎亥以北有一个黑齿国，这里的人是黑色的，吃稻和蛇，身旁有一条红蛇和一条青蛇（一说黑齿国在豎亥以北，这里的人长着黑头，吃稻用蛇，其中一条蛇是红色的）。

《大荒东经》再次提到了这个方国：“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这里是说，黑齿国人是上古时代的帝王帝俊的后代，姓姜，吃黍，驱使四只鸟。《山海经存》有注云：“南蛮人好食槟榔，故多黑齿。”说明黑齿国人的黑齿是因饮食习惯而自然形成的。

《山海经》对黑齿国的记述并不是孤立的，这个方国在其他的历史典籍中也有记载。《后汉书·东夷》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倭无君主”，有一女子被立为王，称为“女王国”；自女王国往南4000余里是朱儒国，“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驛所传，极于此矣”，这里叙述了黑齿国与人们熟悉的倭国之间的位置关系。《南夷志》载“黑齿以漆漆其齿”，已不再因食槟榔而黑齿，而是故意以漆漆之。《异物志》载，黑齿国也叫“西罗国”，“在海水，以草漆齿，用白作黑，一染则历年不复变，一号黑齿”，与《南夷志》所载相似。

现代学者认为，按照黑齿国与倭国的地理关系判断，黑齿国应是现在的东南太平洋上的岛国，这一带的居民在数千年中保持黑齿的传统，开始可能因吃槟榔所致，后刻意用植物将牙齿染黑，以黑齿为美，而且黑齿国人有中国血统。

那么，中国人是否在上古时代就具备了到达这些岛国的能力呢？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孙光远认为，“中国沿海居民很有可能曾在遥远的时代就从海上航行到东南亚与南洋一带，并成为波利尼西亚混合民族的主要人种来源之一”。

《山海经》对海外方国情况的记载，反映了上古时期中国人对海外地区的认识，从而提醒人们，早期的中国人很有可能涉足过这些地方。

## 记录沿海民族生活：崇拜龙、发明舟

龙崇拜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腾崇拜和神崇拜之一，而沿海民族无疑是龙的最早崇拜者。《山海经》多处提到龙，真正与龙崇拜密切相关的，是《大荒东经》和《大荒北经》对应龙的记述。

《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蚩尤是炎帝的大臣，“蚩尤作兵伐黄帝”是由黄帝和炎帝的斗争引起的。炎黄大战，炎帝兵败，蚩尤奋起为炎帝复仇。应龙是有翼的龙，黄帝命令它在冀州之野攻打蚩尤。应龙蓄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制造了大风雨。黄帝请下天女魃，雨就停了，于是杀了蚩尤。杀死蚩尤和夸父后，应龙去了南方，故南方多雨。

《山海经》为什么要把应龙塑造为雨神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相信天降雨水与地上的水有关。远古时期，人们认为天上不可能大量蓄水，水蓄于地上的江河湖海，尤其是大海，一片汪洋，是水主要的贮存处，天上之所以能降雨，是由某种动物将水输送上天所致，而这种动物便是龙，《山海经》将其称之为“应龙”。

自从应龙具有了降雨的神力，人们对它产生了崇拜之心。在后世的塑造中，人们就把龙和应龙逐渐融为一体，就有了龙和应龙关系的解说。很显然，《山海经》告诉我们，祭祀龙的习俗，是从上古时代华夏先民尤其是沿海民族崇拜应龙开始的。

《山海经》还多次谈到沿海民族的其他习俗，例如饮食习惯。海外和大荒有多个方国的人以吃鱼为生，他们的捕鱼方式多种多样。

《大荒北经》说，无肠国、深目国的国民都以吃鱼为生。《大荒南经》介绍了一个叫张弘的方国，那里的人长得像鸟，有喙，有翅膀，能驱使4只鸟在海上捕鱼。《海外南经》介绍了长臂国，那里的人们手臂很长，“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这两条鱼并不是他们的收获，而是捕鱼的工具，也就是用鱼捕鱼。还有一个叫交胫国的方国，“衣鱼食鸥，使两鸟夹之”，就是以鱼和海鸥为食，驯养鸕鹚一类的鸟，帮助捕鱼。

这些描述，虽然都把人神化了，但其所反映的上古时代沿海民族的生活状况是真实的。因为有些习俗如沿海居民吃鱼的习惯，渔民驯养鸟用于捕鱼等，被保持至今。

舟船是海洋文明的重大成果，它对于人类征服海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山海经》有多处提到造舟，《大荒西经》：“丘方员（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即是说，位于方圆300里的卫丘，其南部是帝俊的竹林，大的竹子可以用于制造舟船。《海外东经》记载了一个方国，名叫大人国，“为人大，坐而削

船”，说这个国家的人长得很高大，坐在那里就可以制作独木舟。

不同文献典籍记载了独木舟的不同发明者，而《山海经》给出了独木舟发明者的另一种说法，这也是目前看到的最早记载，说“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是谁呢？《海内经》说：“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也就是说，番禺是帝俊的曾孙，是他发明了独木舟。这一记载虽然只是众多说法之一，但它反映了中华海洋文明的源远流长，是非常有价值的。

## 传承远古神话：精卫填海的海洋精神

《山海经》以简短的语言，讲述了多个海洋神话，而在这些神话中，包含了作者对海洋等自然景观的认知。其中体现华夏民族征服海洋的愿望和精神的故事，本文开头的“精卫填海”就颇具代表性。

《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南朝《述异记》延续了精卫填海的故事：“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其名自呼，每衔西山木石填东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鸟誓，一名冤冤，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

精卫填海的故事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它体现的海洋精神，符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海洋相处形成的情感认同。精卫填海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海洋拥有巨大的能量，人类在海洋面前是渺小的、孱弱的，人类必须建立起对海洋的崇拜和敬畏；其二，海洋并不能左右人类的所有，人类在与海洋的相处和斗争中，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必须拥有征服海洋的信心和勇气。这就是《山海经》透过几千年的时空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山海经》是一部保存有上古时代和夏商周时期丰富海洋文化信息的重要著作，充分体现了海洋文化自身的嬗变更新与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气魄，也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经略海洋、敢于征服海洋的民族，早在5000年以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山海经》的流传于世，预示着这一文明必将发扬光大、源远流长。

【作者系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首席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授】



马俊杰著《沧海岁月：中华海洋文明史论》。出版社供图

# 到江南寻访“周处除三害”的历史遗存

自相残害，怙恶周处去杀蛟和虎。周处用了三天三夜，以勇力杀了虎与蛟，返回家乡，却见乡人误以为他已死了，正在庆贺。周处这才意识到自己名声之差，于是决定悔改前非，前往吴郡拜会名士陆机、陆云，最终成为一名忠义之士。

“周处除三害”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其作为中国古代“浪子回头”的经典故事在后世广为传播。事实上，周处本人在东吴末年的历史中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吴任东观左丞、无难督，入晋后为御史中丞，弹劾贵戚，为权贵所忌，在平定关氏羌叛乱中孤军奋战，战死沙场。临终前，他还留下了一首慷慨悲壮的绝笔诗以抒心志：“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终。”晋朝追赠其为平西将军，谥号为孝。

在周处出生及早年活跃的江南一带，尚存有不止与周处及其家族相关的历史遗存。江苏省南京市在东吴时是国都建业，也是周处最早仕宦的地方。今南京市秦淮区老东门东文化街区东侧存有周处读书台，是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处为一略高出四周平地的高阜，形似土台，相传为周处早年刻苦读书的地方，但实际上，这里是周处担任吴东观左丞的堂宅。历经岁月沧桑，如今此处仅存拥有“周处读书台”的石门楼一座，和已改为民居的房屋十数间。目前，该地正在进行更新改造，计划建成历史人文空间的公共休闲场所。

江苏省宜兴市是周处的家乡，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历也与周处家族有关。西晋末年，周处之子周玘三兴义军，平定叛乱，朝廷置义兴郡，辖阳羡、国山、临津、义乡四县，以为嘉奖。宋时，义兴避太宗赵光义讳，更名为宜兴，沿用至今。周处家族“义兴周氏”在东吴初年是江东世家门阀中的佼佼者，与吴兴沈氏并称，时谚云：“江东之家，莫强周沈”。

今宜兴市内有一条蛟桥河，又称长桥河，它西至团圞，东至狄溪河，被宜兴市民称为“母亲河”，蛟桥河步行街也是宜兴繁华的商业街区。此河名称正是由传说中周处少年时斩水中恶蛟之处——蛟桥而来。据载，蛟桥为东汉年间袁任阳

羨长时建造，原桥早已不存，后人于蛟桥河与团圞交接处复建了一座单孔拱桥，以兹纪念。宜兴城南山背山有“老虎墩”，此地据传为周处所杀南山猛虎的巢穴，后人在此修建了一座射虎亭。

1952年12月，江苏宜兴精一中学师生在挑土平整操场上的的一处小土丘时，发现了一处砖室墓群。1953年春，华东文物工作队派员对发现的两座墓群作了发掘，此后又发掘了4座。这6座墓南北排成一列，其中一号墓发现有刻字的青砖，上书“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阳羨所作周前将军砖”。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与文献所载的周处阵亡年代相合，故可认定此为周处墓。这一墓群应为周处家族墓葬，墓主还包括周处之父周舫、周处之子周玘等，这也符合当时世家大族聚族而葬的习惯。

周处家族墓的发掘还引发了我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一个争议话题。1955年，负责周处家族墓清理发掘的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在整理出土文物时，将该墓出土的一件金属残片交南京大学化学系做成分分析，得知内层为含铝约85%的铝铜合金。此发现经由考古报告发布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轰动。

因为铝是一种极难冶炼的金属，需要2000摄氏度的高温，西方最晚在1825年才从氯化铝中提炼出几毫克不纯的铝，而如今普遍使用的电解铝的方法则要到1886年才实验成功。而中国在3世纪的西晋就冶炼出了纯度较高的铝合金，这的确是一则不可思议的新闻。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对此表示质疑，他将周处家族墓中发现的16件带饰标本提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进行重新鉴定，结果表明这16件较完整的带饰都是银的，另有小块残片中也有银也有铝。夏鼐认为该墓中出土的小块铝片“是有后世混入人物的重大嫌疑，决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此后，多数学者倾向于夏鼐的看法。

但罗宗真仍坚持铝片为晋代遗物，强调“出土地层并未扰乱，铝质残片并非混入物，而是有

确切出土依据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则提出了新的思路，他认为经近年来研究发现，自然界存在天然铝，周处墓出土的铝质残片也可能与天然铝有某种关联。至今，周处墓出土铝质残片仍是考古界的一桩悬案。

距离周处家族墓（周墓墩）不远即是周王庙，是为纪念周处所建的祠庙。该庙始建于西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原名周孝侯祠，宋绍兴年间赠额曰“英烈”，加封“武惠正应王”，称周王庙，历代均有修建。现存建筑为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重建，大殿内存有唐、宋、元、明、清历代碑刻18方，均系历代维修周王庙的碑记。其中以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所刻《平西将军周府君碑》最为珍贵，题刻称碑文最初由西晋文学家陆机撰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书写。但此说与碑文多有抵牾，如文中提到了“建武元年”和“太兴二年”的事情，而当时陆机已遇害多年。

位于宜兴市张渚镇国山上的东吴名碑《禅国山碑》也与周处有关。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阳羨发生地震，离山上出现长约十丈的石室，吴主孙皓认为是祥瑞之兆，遂派大臣在此举行禘礼，将离山封为“国山”，刻石于山阴，即现存之《禅国山碑》。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载，孙皓派往阳羨执行禘礼的两位大臣是“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

周处能够被临时任命、代理九卿之首的太常一职，说明周处及其家族在当时已受到孙皓的器重和扶植。学者魏斌据此认为，这可能是孙皓时期利用吴兴大族打压吴郡、会稽大族的一个表现。但令人不解的是，现存国山碑碑文上镌刻有多达11位参与禘礼的东吴大臣，却独不见周处之名，与文献所载不同。清人吴騄在《国山碑考》中认为这是因为周处为人刚直不阿、不肯媚事庸主的缘故：“观碑所列诸臣名，而（周）处独不预，可见处素刚正，必不藉此以阿其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返：三国现场》作者）

## 一物

### □ 抗侃

1950年秋，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在河南辉县进行发掘，由此拉开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大幕，其成果刊布在“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报告》中报道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铜鉴，原报告描述这件铜鉴时说：

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器形与一般战国式铜鉴相似，大口小底，两耳垂环，口缘外折，平底无足。……表面光素，里壁用利刃精刻花纹两列，纹细如发，用放大镜始清楚可见。……内容颇丰富，大底半周属燕乐，半周属射猎。燕乐部分，以建筑物为界，左钟右磬，计可显现者人28，鸟兽8，器43。左以垣垣房檐为界，右以垣垣绳索纹为界。涉猎部分，人9，林木鸟兽30，器23，皆园林池沼风物。

经傅嘉年先生的复原研究，铜鉴上描绘的高台建筑由3层组成：下层中心是夯土台，夯土台四周绕以廊，廊中正中立都柱，都柱两侧各有辅柱承托上层，中心部分四周亦绕以廊。上层中心应是堂，四周设廊，堂与廊檐形成重檐。脊上方有叉形脊饰。上层中檐刻出筒瓦和板瓦的图像。三层柱上都置炉斗。

这件铜鉴所反映的建筑形象，可以作为战国时期普遍兴建的高台建筑的一个代表作。宿白先生认为：“魏位于中原地区，是当时文化水平最高的所在，这个台榭图像，比成阳秦的殿堂进步多了，也可能比中山王墓享堂进步，可以看作战国建筑的代表作品的图像。”

在列国纷争、百家争鸣的年代里，“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成为那个时代的共同取向，由此诞生了一批著名的高台建筑，如楚灵王六年（公元前535年）“举国营之，数年乃成”的章华台，“台高10丈，基广15丈”，曲栏拾级而上，中途休息三次才能到达顶点，故又称“三休台”；楚灵王好细腰，宫廷里满是细腰宫女，所以章华台又被称“细腰宫”。这种对建筑高度的狂热追求，一直持续到汉代，《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一座形制特别的高楼“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

但是，这种对建筑高度的追求只是盛极一时。中国古代建筑此后更悠久的传统，是追求在平面上纵深发展所形成的建筑群与庭院之间的空间变化。潘谷西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组合见长：

宫殿、陵墓、坛庙、衙署、邸宅、佛寺、道观等，都是众多单体建筑组合起来的建筑群。其中特别擅长运用院落的手法，来达到各类建筑的不同使用要求和精神目标。人们对所在建筑群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也只有进入各个院落才能真正得到。庭院是中国古代建筑群群体布局的灵魂。

追求极致是人类的天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古代建筑放弃了对高度的追求，而去发展院落式的群组布局呢？

根据傅嘉年等先生对于战国时期高台建筑图像的研究，结合考古发现的高台建筑遗址，可以发现，古人为了追求建筑的高度，曾经在两个方向上做过努力：其一是用夯土夯筑基础，在每一层夯土基础上用木材构筑出楼阁的外观，这种高台建筑可以使每一层的开间得以保障，但每一层的立柱和立柱之间并没有结构上的必然联系；其二是井干楼，可以在保持高度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开间尺度，但是木材的消耗是巨大的。建筑高台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国语·楚语》中记载“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伍举对楚灵王说：“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

中国古代对于高度的追求保存在了塔的建造中。仙人好楼居，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印度的窣堵波形式就与汉代的楼阁相结合，形成楼阁式塔。楼阁式塔还不能满足古人对高度的想象，于是，又发明了密檐式塔。

郑岩教授认为，密檐式塔的塔檐虽然密集，但在每层塔檐之间都有一段极短的塔身。在这段高度有限的塔身上，常常制作出风洞。因此，虽然密檐式塔有可能在外轮廓上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但其实质性的组件与楼阁式塔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或者可以看作是一种“压缩”式的楼阁式塔。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压缩，郑岩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克服木结构楼阁式塔在高度上的局限，“砖塔将每一层塔身压缩，利用檐子将有限的高度做了分割，凭借着这种分割和压缩，获得了‘层’数的增加，由视觉而引发联想，从而获得概念上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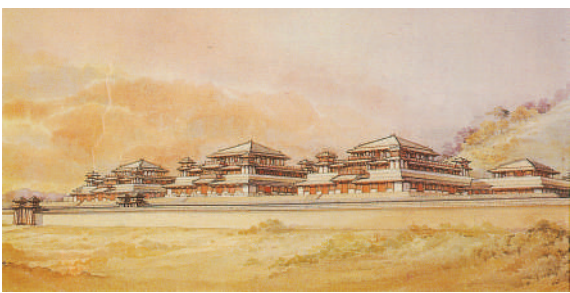
塔确实满足了我们对于高度的希冀，木材的使用在高度上可以达到很高的成就，如现存的应县木塔，这个成就是木构技术发达之后取得的。然而木塔在空间方面存在缺陷。塔上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除了少数瞭望塔，没有更多的实用价值。

砖石材料在理论上可以满足我们对于建筑高度和空间的需求，但是，中国的工匠对于砖石材料的运用并不娴熟。梁思成先生称之为“用石方法之失败”，指出“中国石匠既未能尽量利用石性之强点而避免其弱点，故对于垫灰问题，数千年来，尚无设法予以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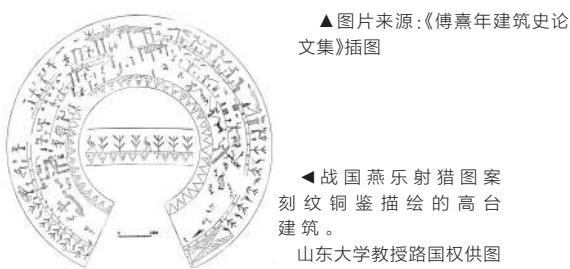
从战国时期高台建筑兴建的潮流，以及傅嘉年先生所称“中国古代台榭建筑衰落消失”的过程来看，木结构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经济的、技术的和观念的因素是相互制约的。

此时，我们再回望战国秦汉，那确实是一个让人血脉偾张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图片来源：《傅嘉年建筑史论文集》插图



▲战国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描绘的高台建筑。山东大学教授路国权供图